

01 / 2020 总第25期

# 当代中国 价值观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Values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念资源与现实探索 臧峰宇 罗兰·博尔

康德论人的尊严——兼论尊严的可丧失性问题 罗 喜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平等面相——兼与孟旦的“自然平等”比较 曹成双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哲学咨询与治疗 丁晓军 喻 丰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01 / 2020 总第25期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Values

#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Values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耕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丹 万俊人 马俊峰 丰子义

王南湜 石中英 冯平 过常宝

江畅 江怡 许燕 孙正聿

孙伟平 李萍 李景林 李景源

李德顺 杨共乐 杨国荣 杨耕

吴向东 吴晓明 汪信砚 张一兵

张曙光 陈来 欧阳康 郝立新

韩庆祥 韩震 戴木才

约翰·阿巴诺 (John Abbarno)

安乐哲 (Roger Ames)

丹·布隆迪 (Dan Brudney)

托马斯·麦格奈尔 (Thomas Magnell)

主编 | 吴向东

副主编 | 兰久富

# 目 录 | 2020 年第 1 期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念资源与现实探索 / 臧峰宇 罗兰·博尔 ..... 5

## 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调研分析：主题和方法的变革 / 张海燕  
包娜仁其木格 ..... 15

## 价值观基础理论

康德论人的尊严——兼论尊严的可丧失性问题 / 罗 喜 ..... 24  
史密斯如何回答“道德问题”？ / 李大山 ..... 36

## 传统价值观与现时代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平等面相——兼与孟旦的“自然平等”比较 / 曹成双 ..... 43  
“不忍人之政”何以可能？——兼评“从仁政走向义政” / 王觅泉 ..... 52

## 西方价值观理论研究

欲力的机制——斯宾诺莎哲学中善恶概念的推理结构 / 郑旭东 ..... 61  
个体可普遍化的意志：关于卢梭公意与自由关系的再解读 / 夏 语 ..... 73  
达尔文式群体结构和利他主义的发展 / 张秋芝 ..... 85

## 现代性的价值反思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哲学咨询与治疗 / 丁晓军 喻 丰 ..... 94  
资本时代的城市化问题及其伦理出路 / 周 罔 ..... 105

## 国外价值理论译介

李凯尔特与作为有效性的价值 / W. H. 威尔克迈斯特 / 文 田立鹏 / 译 ..... 113

# Contents

No. 1 2020(Vol. 5)

ZANG Fengyu; Roland Boer /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and Realistic Exploration of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	5
ZHANG Haiyan; BAO Narenqimuge / An Analysis of Social Research in <i>The Situ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i> : A Revolution in Themes and Methods .....	15
LUO Xi / Kant on Human Dignity—On the Issue of the Loss of Dignity .....	24
LI Dashan / How does Smith Solve “the Moral Problem”? .....	36
CAO Chengshuang / Equality i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f Pre-Qin Confucianism — A Comparison with Donald J • Munro’s “Natural Equality” .....	43
WANG Miqian / How is the Governance of Compassion Possible? —With a Comment on the Thesis “from Benevolent Governance toward Just Governance” .....	52
ZHENG Xudong / The Mechanism of Conatus—The Deductive Structure of the Notion of Good and Bad in 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 .....	61
XIA Yu / The Generalizable Individual Wil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usseau’s General Will and Freedom .....	73
ZHANG Qiuzhi / Darwinian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 .....	85
DING Xiaojun; YU Feng /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under the “Healthy China” National Strategy .....	94
ZHOU Jiong / Urbanization in the Era of Capital and Its Ethical Outlet .....	105
W. H. Werkmeister / Rickert and Value as Validity .....	113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Values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双月刊)

2020年第1期 (总第25期)

出版日期: 2020年2月25日

---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北京师范大学  
编 辑: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编辑部  
出 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电 话: (010) 58803864  
传 真: (010) 58803864  
邮 箱: ddzgjzg@163.com  
微 信: ddzgjzg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

ISSN 2096-1723



出版刊物号: CN10-1362/D  
定价: 25.00元



编者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小康”都有其观念资源和特定含义。改革开放之初，“小康”是在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上提出的，以此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小康社会的战略定位和思想内涵逐渐明晰，其中国话语特征也不断得到彰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小康社会还会出现新问题、新矛盾、新特点、新目标，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着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真正实现，更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实现。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念资源与现实探索，本刊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罗兰·博尔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以飨读者。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念资源与现实探索<sup>\*</sup> | 臧峰宇 罗兰·博尔

**【摘要】**“小康”有着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入探究“小康”的文化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矛盾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深入理解美好生活的文化价值，在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强调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认识到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对立体现为斗争性，统一体现为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观念资源；现实探索；矛盾分析；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23(2020)01-0005-10

**【作者简介】**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兰·博尔，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

罗兰·博尔：峰宇，我们谈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确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取得“决胜”。实际上，关于“小康社会”的翻译，我建议使用术语的拼音，因为它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

臧峰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奋斗目标之一，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当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针对中国发展难题的政策导向更为精准，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

\*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比较语境中的中国话语研究”(ZK20190213)的阶段性成果。

## 一、何谓“小康”与“小康”何为

罗兰·博尔：我知道，邓小平在1979年使用过“小康”这个词，在对日本首相简短而重要的评论中，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sup>①</sup>接着，邓小平谈到了“小康的状态”和“小康的国家”。但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文献可见，他首选的用语是“小康水平”，也在一些场合使用过“小康社会”。然而，就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而言，关键是“小康”。你能说说邓小平为何采用这个特定的术语以及它的古老含义是什么吗？

臧峰宇：“小康”一词源自《诗经·大雅》，指的是一种丰裕安乐的社会状态。在《礼记》中可见孔子关于“小康”和“大同”的论述：“小康”是守“礼义”“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丰实有序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向往“大同”，那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从中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上个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们从实现温饱到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21世纪再经过30—50年的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多年来，中国人实际地理解了“小康”的内涵，通常将其理解为物质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罗兰·博尔：“小康”显然有着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我知道讨论《公羊传》是很重要的。何休在解估中通过“衰乱”“升平”和“太平”三世说重新安置了儒家的秩序。如果聚焦于“升平”，何休对孔子的社会秩序说的重新安置有何意义？事实上，至少在何休看来，“升平”就相当于“小康”。

臧峰宇：正如你所说，“小康”具有复杂的内涵，是否应当这样类比还要进一步探讨。三世说是何休在对《公羊传》的解估中提出的，当然这在《公羊传》中即有端倪。何休以“妙得公羊本意”著称，他重新安置以往儒家流行的社会秩序说，实则是对经典的引申和提升。作为公羊学历史观的核心，三世说表明人类社会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过程而演化。后来龚自珍认为“通古今可以为三世”，疾呼乱世即来，倡导变革以避免陷入深重的社会矛盾。

罗兰·博尔：何休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以“所传闻”“所闻”和“所见”提出了语词和世界之间的三重区别。我的理解是这三个范畴与上面提到的三世有关。这意味着“所闻”的世界以升平或和平崛起为特征。在我看来，这似乎接近于或相当于“小康”。

臧峰宇：何休阐释了《公羊传》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句话。以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为坐标，董仲舒曾将242年的春秋时期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通常认为，这三世对应的是“太平世”“升平世”和“据乱世”。“升平”反映了和平崛起的态势，你认为“升平”相当于“小康”，或许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影响。

罗兰·博尔：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另一个阶段出现了康有为和他的《大同书》。我最感兴趣的是以下文字，对此，我也试图翻译，因为现有的劳伦斯1958年翻译的英文版不太好：“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sup>②</sup>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② “统”具有团结、联合和管理的意思。

后，进以大同。”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兴趣在于“大同”，但在我看来，他的阐述与何休的“升平”和孔子的“小康”有明确的联系。毛泽东提到过他的著作吗？

臧峰宇：康有为的《大同书》借鉴了《礼记》和公羊学思想，对三世说进行了系统化阐释，其中映现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印记。你说的对，他关心的是“大同”，而且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欧美国家已经达到“升平世”，中国要经过这个阶段，进入“太平世”，也就是“大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这是他的社会理想，他认为应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一度欣赏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求进步的中国人，康有为的维新之路没有走通。直到“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①</sup>

罗兰·博尔：还有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礼记》中，孔子以两种方式使用“天下”一词。首先是“天下为公”，它可以被译为“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这与大同有关。但是，当他谈到小康时说的是“天下为家”，这或许可以被译为“天下是一家人的天下”。康有为多次使用“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虽然他特指的是“大同”。我知道这也是孙中山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这个说法的含义是什么？

臧峰宇：“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在《礼记》中被用来说明两种社会状态。作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规定，“大同”意味着丰裕、和谐而公有的社会，在这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朴素的未来社会理念。据说，孙中山最喜欢题写的就是“天下为公”，他认为“四万万人都拥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由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罗兰·博尔：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要点的阐释。我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前面你提到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它深受外在超越的影响。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utopia(没有的地方)”的中文翻译是“乌托邦”。这是一个舶来语吗？为什么它没有出现在中国传统中呢？第二，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在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我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中文翻译很感兴趣。字典告诉我，空想的意思是“空洞的思想”“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你能解释为什么这样翻译吗？

臧峰宇：你的问题引人深思。“乌托邦”是一个舶来语，最早将其译为中文的是严复。中文“乌托邦”与英文“utopia”读音有相近之处，语义也颇为契合。在中文中，“乌”即无，有“子虚乌有”之意；“托”意为托付、寄托；“邦”即国。这个翻译很接近莫尔的《乌托邦》的本意。很难说中国古代没有乌托邦思想，只是没有这么明确的概念。例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场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就带有这种色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空想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这个中文翻译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大概从合成词的角度理解“空想”更好：“空”是 nothing，“想”是 thought，意思还比较接近。你能谈谈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的流变吗？

罗兰·博尔：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乌托邦”的希腊文含义是一个刻意的双关语。“Topia”来自希腊语“topos (τόπος)”，意思是“地方”。但这个词的第一部分是双关语。一方面，“u”(希腊文 οὐ)意味着“无”，另一方面，它听起来像“eu”(希腊文 εὖ)，意思是“好”。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471页。

所以，“乌托邦也是好地方”：没有的地方也是一个好地方。

臧峰宇：在中国思想家看来，“无”是有的来源，或者说“无中生有”。“无”既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是“大有”或“妙有”。这与希腊文“ou”似有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中文词“乌托邦”也让人觉得可能是个好地方，但这个地方有过多的理想色彩。很难确切地说它有没有、在哪里，它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罗兰·博尔：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无”的地方？也就是说，普通人实际上找不到它。它太理想化，太完美，但人类的存在并没有那么理想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本体论超越或外在超越的西方传统。因此，一个更好的甚至是完美的世界存在于人类的感知和理解之外，而人类的世界是这个更完美的世界的可怜的副本。重要的是，即使人类不断努力，也无法进入这个超越的世界。这个意义是乌托邦概念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超验的世界，在一个我们无法找到或不能到达的地方。在西方的乌托邦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方式是，这个乌托邦世界在一个遥远的岛屿上（正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或者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如在科幻小说中），或者在一个难以想象的未来，正如在威廉·莫里斯 1890 年写的小说《乌有乡消息》中。

臧峰宇：“乌托邦”与西方本体论传统确实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西方哲学家首先设定有一个比现存的世俗世界更好的地方，并将其视为人类世界应当存在的原本。这体现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和人们对美丽新世界的追寻，但颠倒了原本和副本的关系。正如你所说，问题是人们无论多么努力，也不能抵达这个超验的世界。除了莫尔的《乌托邦》，你提到的《乌有乡消息》在中国也为很多人所了解。当人们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抵达这个乌有乡的时候，就会将其理解为一种非经验的、非现实的世界，或者说，是一种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乌托邦”就呈现出一定的宗教性。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早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有基督教背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理解。

罗兰·博尔：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方面，乌托邦的这种含义也带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因为理想的世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天堂或天国。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与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关联。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像傅里叶、圣西门和威廉·魏特林都受到这种背景的影响，尽管他们都试图转而聚焦于世俗世界。实际上，宗教传统具有本体论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可以被称为“本体论超越”或“世俗的超越”。虽然天堂是一种不同凡俗的完美的本体论的存在，但在未来，在历史的终点，还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人间天堂”。第二点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欧洲和北美的很多实验——通常都是小型社区——都是基于他们的理念建立的。

臧峰宇：这个彼岸世界是一种完美的本体论的存在，它也被视作世俗世界的理想摹本。圣西门这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关注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形成了一些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哲学思路，他们强调实业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的世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的思想带有很强的乌托邦特征，在他们看来，理想社会依靠天才建成，实业制度需要“天然领袖”，这种重视一流科学家、银行家、企业家等的思路当然有一定道理，问题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相比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具有明确的现实性特征，他们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键是，确认了未来社会的主要实现力量。

罗兰·博尔：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批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他们首先赞赏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贡献，但也强调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阶

段的特征。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们会同意加入按照他们的意愿建立的社区，并为他们提出的社会的优越性而叹服。但他们缺乏两个关键的特征：对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应地研究人们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世界的实际问题。

臧峰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验停留在探索阶段，确实不够科学、细致，他们也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结构的思考缺乏合理性思路。他们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公，这一点与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乃至青年黑格尔派都是相似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人类解放的使命，他们将砸碎旧世界的锁链，在解放全人类之后解放自己。

罗兰·博尔：我的感觉是，这种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和空想社会主义使受西方影响的人们不易理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计划。他们可能将其视为“乌托邦”，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社会，但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属于一种“没有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通过认真研究，制定政策，设计和行动，实现小康社会的计划非常实用。如何向西方世界解释小康社会事实上能够实现呢？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涉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实际措施。我想知道，有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境中发展出来的某些观念可以用来揭示这个计划？

臧峰宇：中国人对小康社会有很实际的思考，而且在多年努力中逐渐使之成为现实。你的感觉是有道理的，这里存在一种文化差异，有必要更好地向世界阐释“小康”的本意。建设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因而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之一。邓小平将其称作“中国式的现代化”，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思路与西方的现代化不尽相同。当然，这里有实际的指标，例如人均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说过，“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明繁荣富足的经济生活对于哲学、道德、宗教、法治等上层建筑具有基础性意义。所以，中国多年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这也涉及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

罗兰·博尔：这很有趣。我注意到，所有的中国政策都采用了这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将经济基础作为其他方面的关键。我记得在2019年初的一次会议上，一些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的访问学者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论坛上提交了论文。在介绍论文之后的问答环节，有位听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道路的基础是什么？是文化吗？”中国的访问学者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说，“是经济。”提问的人点了点头。“是的，”他说，“我应该知道，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关键。”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很难理解。

臧峰宇：这个思想方法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常识。它来自于人们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也与中国务实的文化传统有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可观的成就，为文化建设和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从教育领域来看，195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为11.6亿元，到2018年增长为4.6万亿元。中国各级教育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在多年来得到明显改善，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得到明显提升。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释放文化发展活力作为应有之义。回顾包括文化发展在内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就会感到文化自信的底气，这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理。这个原理也表明，文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sup>①</sup>

罗兰·博尔：这正是我要说的，你指出的另一部分也非常有趣。你提到了管仲的话：“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的悠久传统显然不仅强调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与社会和谐的紧密关系。我们能否回到小康的话题？我对“康”的语义域很感兴趣。它通常被翻译为“繁荣”或“小康”。显然，这种翻译带出了这个词关键的经济含义。但有些西方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意味着“拥有良好的收入”，希望人们能致富。你能否提供关于“康”的另外一些相关含义？

臧峰宇：我对“康”的语义域没什么研究，但你对此的兴趣让我想到“大康”。《诗经》有云：“无已大康，职是其居。”朱熹注曰：“大康，过于乐也。”后来人们用“大康”表示安丰泰乐，也有市县以“大康”命名。在《诗经》中也提到了“小康”：“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当然有“拥有良好的收入”的意思，但内涵显然更加丰富，包括拥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可观的道德风尚与心情愉悦等。现代人更重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例如，认为市场经济应具有道德前提，为此专注于探讨“斯密问题”。我想知道你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罗兰·博尔：我的理解是，亚当·斯密是在欧洲一场漫长的辩论和争议的结尾加入的，他的观点涉及到“贪婪”和“自利”的差别。这些最初是通过宗教或神学的方式理解的，因为贪婪在社会和个人的意义上都被视为“罪过”。即使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也将个人的“贪婪”视为恶习，尽管它可能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斯密往前走了一步，将“贪婪”重新定义为“自利”，作为道德哲学家，他认为这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晚餐并不来自于屠夫、啤酒酿造者和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源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换句话说，追求纯粹的自利，赚钱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利益；斯密认为，社会上每个人都从这种自利中获益。显然，因为缺乏对社会利益的考虑，斯密被证明是错误的，道德利益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臧峰宇：这里确实涉及到对自利的正当性的理解。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贪婪”和“自利”的边界没有清晰的界定，任何考虑私人利益的愿望似乎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如你所说，是有罪的。在哈奇森这位著名的道德哲学教授的笔下，“贪婪”是一种恶习。斯密肯定了“自利”的个人和社会意义，认为在现代社会，对利益的合宜追求比仁慈更重要，仁慈当然好，但人们不能要求他人一定要仁慈，而每个人追求合宜的利益是正当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对“义”和“利”的关系的讨论，这也涉及到小康的丰裕与正义的内涵。在强调追求实际利益的语境中回视这个看法，可以看到其中的启发意义：问题不在于追求利益，而在于追求谁的利益，如何追求正当的利益，以及如何理解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矛盾分析

罗兰·博尔：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你特别关注到，小康包括“安全、有保障的生活、可观的道德和愉悦的社会环境”。实际上，我对《诗经》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了这段内容：“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民亦劳止、汙可小愒。民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亦劳止、汙可小安。”每一句的唯一变化是在“小”之后的最后一个字中。第一句显然是小康，但是，似乎后面几行对小康作了进一步扩展，包括小休、小息、小憺和小安——如果我弄错了，请你纠正我。你认为我们在重审这一古老的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时，是否会对上述在后来得到发展的这段话有所理解？

臧峰宇：《诗经》中强调“民亦劳止”的这段话，讲的是老百姓太劳苦了，省去的段首句后面的话是建议君王防止小人和歹人的奸计或恶行，以求国泰民安。这里的小康指的是老百姓稍微舒服安康一点，后来引申的意思是享有比较殷实的生活。正如你所说，人们对这段话的理解后来不断深化。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小康”进行重新阐释时，不仅强调生产力标准，而且认识到发展的人民性，使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际内容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城乡发展的需要中。

罗兰·博尔：我认为这是我们回到当前的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汲取了这一悠久的中国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重新解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似乎已经期待和盼望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些时候走近了，但又一次从中跌落。显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这样的小康社会才具有一种现实而具体的可能性。

臧峰宇：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在1979年召开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是一致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幸福的理解以及对物质生活的限度的反思也逐渐深入，实际地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实而具体的可能性。

罗兰·博尔：在我看来，这一进程的历史也许更长，而且离现在更近。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进程就开始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向前迈出了全新的一步：从那时起，消除贫困，改善生活水平和解放生产力取得了巨大飞跃。最近，我注意到强调正义，尤其是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国走向繁荣中受益：消除最后百分之几的贫困，建设生态文明，并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臧峰宇：你说得对，改革开放向前迈出全新的一步，中国在扶贫方面做出很大努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取得很大的成效。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绝对贫困将彻底消除，曾经贫困的人们生活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也在倡导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赢得了尊重和友谊。建设生态文明，我觉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性努力，这不仅表明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稳步提升的必然要求。

罗兰·博尔：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当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出现的矛盾得到解决后，小康社会潜在的新矛盾可能是什么？是否会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据我所知，这需要人们进行彻底的科学分析，以识别这种矛盾。对小康社会也是如此。

臧峰宇：我们需要对小康社会做科学的矛盾分析。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也必然会找到解决矛盾的新方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的主要矛盾。当然，美好生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价值范畴。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对这个范畴有了越来越明晰的感性认识，也遇到很多现实问题。

罗兰·博尔：是的，问题仍然存在，它与毛泽东发端于中国语境中的矛盾分析概念有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新的主要矛盾。习近平从基本需求和体面生活的角度将这一新矛盾与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人们长期以来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现在更加复杂：“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sup>①</sup>同时，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但这种生产能力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问题，因此需要解决。

臧峰宇：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然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你说得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多方面的，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多年来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不断满足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反映出的人们的进一步需要，包括你所说的体面的生活，这正在不断地成为现实。中国的生产能力为满足人们进一步的需要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强调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罗兰·博尔：因此，正确识别主要矛盾至关重要，因为这会影响政策决策。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底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满足基本需求并实现所有人的体面生活，新的矛盾将如何发挥作用？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方面，是与小康社会直接相关？还是与随后的社会发展相关？

臧峰宇：矛盾体现为一系列问题，也体现为一个过程。解决新的矛盾，就要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理解矛盾与问题的呈现样态。在我看来，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接相关，也与随后的社会发展相关。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会进一步提高，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和方式也将会不断完善。

罗兰·博尔：这就要解决具体问题，在确定了必须应对的一系列挑战之后，习近平将重点放在三个关键问题上：“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sup>②</sup>这三点都值得讨论，你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矛盾的强度是否在增加？

臧峰宇：解决这三个问题在中国都是攻坚战。矛盾的强度一定在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也超过以往。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需要“正确处理”。既要矛盾和问题有正确预见，做到未雨绸缪，也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提高化解矛盾和 risk 的能力。完成这项系统工程，需要底线思维，需要灵活运用解决矛盾的哲学方法。

罗兰·博尔：精准脱贫的问题最初似乎更为直接。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认可中国在扶贫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28页。

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世界银行估计，在过去 40 年中，中国有 8.5 亿人摆脱贫困，这是“前所未有的”人数。这一成就也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成就之一，甚至在 2020 年，我们将看到一种齐心协力使其余贫困的人民群众脱贫的努力。同时，有些西方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遵循源自西方宗教传统的一句古老的谚语：“你们将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他们戴着“彩色眼镜”，认为中国的扶贫注定会失败。

臧峰宇：摆脱贫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其实，贫困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在一些西方国家看到过很多流浪汉，也到过一些穷人居住的社区。尽管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文化认知存在差异，但这个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解决。我赞同你的看法，而且我觉得这种“彩色眼镜”影响视力，让有些人看不到远方。

罗兰·博尔：最后，确认矛盾问题并不那么困难：它介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那些被资本主义制度熏陶的人们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之下，那些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可能做到的。

臧峰宇：从不同社会制度的角度理解扶贫的问题，答案显然是不同的。有些西方学者质疑扶贫的正当性，或者说质疑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是不是穷人所应得的。如果坚持自由至上主义，这种质疑有一种坚固的学理基础，但这种理论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从强调平等和共享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出发，扶贫无疑是正当的。

罗兰·博尔：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环境污染，或者用中文来讲是“生态文明”。也许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个中文术语的含义，因为在这里我想着重讨论它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显然，小康社会和健康的社会都是享受清洁健康的自然环境的社会。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人类在自然中生活”，因此这应该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矛盾，它与前一个矛盾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奴隶，只能看到“市场力量”的解决方案。

臧峰宇：生态文明是反映当今社会进步状况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在中文语境中，它指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家有很多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观点，例如，孟子非常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做法。马克思强调大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恩格斯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都表明人与自然不是对抗性关系。环境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方案当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坚定有力的公共决策，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我记得你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罗兰·博尔：我们可以说，在解决矛盾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吗？邓小平的梦想是，社会主义最终将证明比资本主义优越。他的重点是解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倾向于“零和”方法：你赢了，我输了。对于现在被称为“零和博弈”的矛盾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方法，也就是说，世界上一些国家——以前的殖民者仍然以这种方式思考和采取行动。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遵循这种旧方法。因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习近平的替代方法——共赢——如何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矛盾方面截然不同的方法？

臧峰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邓小平强调“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解决具体矛盾和问题的前提。我们之前讨论过“零和博弈”的问题，这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观念，其实是一种制造矛盾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各国和平发展、携手合作、实现共赢，为化解矛盾提供了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思路，因为矛盾并非都是对抗性的，它是一种对立统一，对立体现为斗争性，统一体现为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兰久富]

###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and Realistic Exploration of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ZANG Fengyu; Roland Boer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n Australia)

**Abstract:** “Xiaokang” has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as well as a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well-off society” and analyze the contradictions in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may be argued that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o revea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requires deepl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value of the Good Life, as well as to further increase productivity, emphasiz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field of distribution, recognizing that contradiction is a kind of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is embodied in struggle and unity as identi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oth sides of contradiction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harmoniously.

**Keywords:**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conceptual resources, realistic exploration, contradiction analy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